

编辑丛书

回顾与展望

赵家璧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回 顾 与 展 望
赵 家 壁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25 字数：10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册

书号：17088·44 定价：1.15元

《编辑丛书》总序

边 春 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编辑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以提高广大出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为目的，可以促使出版工作者增加知识，扩大见闻，提高对书稿的鉴赏力，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编辑作风，促进出版事业沿着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和各项奋斗目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版战线担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无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已越来

越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也越来越被全党和全社会所认识。

改善和加强出版工作，有许多实际问题要解决，包括要切实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大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要统筹安排，制订出书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出好重点书；要尽快改变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的落后状况，努力缩短出书周期，解决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等等。但是，为了适应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队伍，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严重任务。道理很简单，提高出版物质量，增加出版物的品种，就要有一支坚强的编辑队伍；使用先进的印刷设备，提高印刷技术水平，就要有一支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够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职工队伍。有些印刷设备，我们一时制造不出来，还可以引进，但人才却不能靠引进，主要靠我们自己去培养。所以，要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我们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迅速采取各种切实措施，提高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政治理论水平、科学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以

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需要。否则，开创出版工作
的新局面，将会是一句空话。

“编辑丛书”的出版，对广大出版工作者特
别是编辑人员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无疑将
会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我衷心期望把它办好，
办成一个受广大出版工作者所欢迎的读物，真正
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前　　言

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期刊《编辑之友》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编辑丛书》，约请全国各地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同志，撰写自己从事这一工作的经验谈、随感录，或是从自己实践中找出几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把它上升为理论；写法并无限制，既有用散文形式抒写的，又有用教材形式讲述的，方面甚广，题材多样。我认为，这样一套丛书，对最近一二年里，各地编辑出版工作者开始纷纷讨论，如何把文化教育课程中至今还是缺门的图书编辑学和出版学科的建立，将起到积累素材的作用。一砖一瓦都是有用的基础材料，集腋成裘，希望寄托于大家来动脑动手。出版这套丛书，正如边春光同

志在总序中所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今年四月间，在峨嵋举行第二届出版研究年会期间，丛书编者向我索稿，我义不容辞。可惜近年所写编辑方面的回忆史料都已编集出版，但一九八〇年以来，还写过不少不属于这一类史料的文章，内容倒和我晚年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有关，也有些未编集的旧作，可凑成一本杂文集，最初拟用《出版杂谈》为书名。

说起我的编辑生涯，最早是在念高中一年级主编校刊时开始的，那是一九二五年秋，距今正好一甲子，整整六十年了！三十年代大学毕业正式踏入社会，一边当文艺编辑，一边由于自己读的是外国文学，所以曾在这方面从事研究、翻译、写评论介绍文章等，并也出版过一本名为《新传统》的论文集。但我略有自知之明，没有写作才能，当不了作家；因此，一直甘心情愿默默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也把我作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而勒令靠边；随后，又因为四十年代主持过“良友”和“晨光”两个出版机构的编辑工作，成为我最大的“罪状”。一九七二年五月，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的工军宣队限期把我赶回老家，还说这是对我这类“分子”的优

待照顾。回到家里，我把书都卖了，笔也封了，决心从此不问不闻，安度残年。

不料上海市政协当时正在把二三十位与我类似懂得某种外文而闲着无事可做的老知识分子，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编译组，发挥余热，各人在家集体翻译有关国际问题的外文原著，说明书不署名，稿不致酬。我感到我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党，市政协执行的是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干。就这样，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九年，我默默地翻译了七十多万字，和别人合译了斯诺的《漫长的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七八种书。

“四人帮”垮台后，天又亮了，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我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写三十年代当文艺编辑的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九八四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编辑忆旧》。最近，香港三联将出版我的《书比人长寿》，今后还准备继续写下去。

这一股劲从哪里来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了我的积极性。我感到余生有限，如果我写的史料文章，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或出版史研究者

能起一丁点儿参考作用，我也算没有白当了几十年编辑。此外，一九七九年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随后成立的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这两个群众性团体，不但都吸收我为会员，还给了我荣誉和职务。我原来认为五七干校的工军宣队已把我从出版队伍中开除出去。到那时，才认识到那些工军宣队代表的不是党，党从来没有把我除名。从那时起，我才清醒过来，感到忽然年轻了，象获得了新生一样。于是我除了写回忆史料以外，尽力所能及，参加两个协会的各种社会活动：开会、讨论、发言、写文章，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要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特别使我感谢党的，是，去年九月还派我参加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本集共分四辑。第一辑，两篇回顾，写的是我最初怎样走上编辑这条道路的，都是五六十年前的旧事了。第二辑，访日观感。日本出版物曾在三十年代就给了我一定的影响。这次亲自去调查研究，自谓颇有所获，结合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也产生了些新的看法。第三辑，是些发言和短文，先后刊载在各地的出版内刊上，都写

成于八十年代；最后一篇是五十年代的旧作。第四辑，序跋后记之类。时间跨度很大，从三十年代一跃而到八十年代。这里有三部大书，隔了半个世纪，又被重印或初次与读者见面，书和我这个人一样，获得了新生，是值得高兴的！

总之，从这本杂文集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老编辑在过去六十年的经历，有他对过去的回顾，也有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看法和展望。思念过去，又并非仅是迷恋往事而发思古之幽情，主要的还是在一片改革声中，对出版工作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打开一个新局面，说出一些粗浅的意见。此书对编辑学、出版学研究工作者或可提供点滴素材。因此书名改为《回顾与展望》。

建议改用这个书名的是我的老友徐承烈兄，他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现在大家都已进入暮年，我们还是交往频繁，情同手足。这几年，他对我的写作，给予不断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赵家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辑 回 顾

- 1 从《晨曦》想到我的老师
 - 5 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
-

第二辑 访日观感

- 57 电脑编排与出版周期
- 62 怀念仓石武四郎
- 70 谈写日记

第三辑 杂 感

- 76 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想到出版工作
81 我们要书评
83 《中国新文学大系》话旧
88 如何打开出书新局面
94 共同努力办好《出版史料》
101 纪念过去，为了鞭策未来
108 阳朔一夕谈
115 出版工作者也是灵魂工程师
119 “第二个十年”
123 要质量 要速度
127 祝上海书店的新生
132 《书林》要加强批评
136 从美丽的德国图书说起
145 大家来写《中国现代出版史》
-

第四辑 序跋

- 151 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
154 《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前记

158 《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

重印后记

171 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

192 天津版《鲁迅与书》序

198 江西版《月亮下去了》译本修订

重印后记

203 人文版《编辑生涯忆鲁迅》后记

205 三联版《编辑忆旧》后记

209 花城版《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序

从《晨曦》想到我的老师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在沪发生。六月三日，我在附中一年级念书的圣约翰大学，因美国校长卜芳济不让我们全体学生悬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此后就由离校学生、爱国家长张寿镛先生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于短时期内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同时附设中学。秋季开学，我就进入高中一年级。由于全校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热情，附中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学生们自发地要求配合学校，除认真读书外，各自作出些贡献。学生会下设编辑部，规定出版一种象样的中学校刊，经过商议，刊名《晨曦》，每季出三十二开十万字铅印本一期，我被选为编辑之一。说办就办，次

年一月二十日创刊。如果从我开始当学生编辑计算起，距今正好一甲子——六十年。

当年，几个中学生能够编辑出版这样规模的校刊，全靠几位热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学校老师除了在课堂上谆谆教育外，善于观察每个同学的爱好，然后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们从事各种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从实践中自己解决问题。出版校刊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共有十多个同学组成了编辑部，聘请四位老师当顾问。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才去请教老师。老师决不包办代替，发号施令，而放手让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大孩子自己去动脑筋，去实干。他们仅仅指导我们如何去向合适的师生组稿，如何排列每期的选题目录。审稿加工，由学生自己去做。重要的文章才请接近这一方面的顾问去做决审。我记得，学校中搞事务的职员老师，介绍我们到上海浙江路华丰印刷所印刷。跑印刷厂，看校样，都由同学分工负担。当刊物出满四期后，我被推为总编辑。我试行改革，把教会学校校刊半中半西（一半刊英文作品）的传统打破了，全部中文，增加篇幅（每期十二三万字），彩印封面，扩大发行，面向社会。这时学生会所拨经费不够开支，于是

请教了一位教工商管理的商科老师，他向我建议可以向同学家长中经营工商业或挂牌行医者兜揽广告，我这个总编辑便兼了个广告主任，亲自上冠生园、商务印书馆等大企业请求赐登广告。这一着就保证了刊物在经济上的收支平衡。同时又由老师出面，请全校同学推销校刊（每一同学可得赠书一册），向全市各有关地点，不管学校、图书馆、书店等，设经销处，一本小小校刊就这样推向了社会。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全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晨曦》被荣列其中，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对我个人来说，在学习写作、翻译和编辑工作上，得益最多、印象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晨曦》的顾问——潘序祖先生和沈昭文先生，前者虽已退休多年，精神不衰；后者还在上海科学院生化研究所工作。他们都是六三离校后光华的首届毕业生，当时均在附中任教。今年三月，光华大学校友会在上海华东师大科学会堂成立，六百多位几乎都是花甲以上年龄的老校友出席。

我即兴式地在大会上谈了一点感想。我想起我一生中能为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出过一点微

力，归根到底，根是长在光华附中，所以我那天说，我是回母校“寻根”来了。出乎我意外的是这两位年已过八十高龄的中学时代的老师正坐在我的旁边。他们在我发言结束之后，情绪也很激动，都讲了话。他们既缅怀过去，更祝愿今天的老师们，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会后，我紧握住两位多年不见、满头白发的老师的温暖的手，想当面表达一点感谢之忱，但久久说不出话来。《华东师大校刊》发表我那篇即兴发言时，加了个确切而动人的题目，叫做《我忘不了光华，我更忘不了光华的老师们！》这正是我心中要说的话。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希望今天的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也能编辑出版各种校刊，如果能这样，一定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作家和既懂业务又有专长的编辑。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原载1985年8月5日《解放日报·朝花》）